

家庭随迁、居留意愿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罗恩立, 方丹丹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中国正处于人口流动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和流动时间逐渐延长时期。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事关其能否在流入地立足及家庭生存发展, 也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运用OLS回归, 从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视角, 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二者对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均有显著影响, 家庭随迁规模扩大会降低其就业质量, 而长期居留意愿则会促进就业质量提高。同时, 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流动区域、流动时间等个体和流动特征也对其就业质量产生影响。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就业质量; 家庭随迁; 居留意愿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68(2020)03-0117-12

Family Migration, Residence Willingness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6

LUO En-li, FANG Dan-dan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is in an era of rapid increase of population flow,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flow scale and gradual extension of flow time. Among them,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quality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rational flow and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this group, as well as the key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can stand in the inflow area, and also is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6, under the guidance of new economic migration theory,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and regarding the whole floating populatio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lso, this paper uses OLS regression model respectivel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migration and

收稿日期: 2019-05-08; 修订日期: 2019-12-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家庭化迁移与新生代流动女性就业能力研究”(编号: 18BRK041)

作者简介: 罗恩立(1973—), 男,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 方丹丹(1993—), 女,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为劳动力迁移。

residence willingness to analyze the employment quality's affecting factors. We find that the size of family migration decreases the job quality and the longer residence improves the job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dividual and migration characters, such as gender,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migration areas etc.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job quality.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Employment Quality; Family Migration; Residence Willingness

党的十九大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数据显示,家庭成员随迁流动的规模逐步扩大,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2.5人以上(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7)。流动人口家庭成员随迁,一方面家庭作为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部分无疑为其城市发展提供了情感关怀和精神支持;但另一方面,随迁也带来子女和老人照料、家庭住房、生活成本等问题,这些又可能会对流动人口就业产生压力。而居留意愿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与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同时,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可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流动人口更可能把生活的关注点放在家庭的城市发展,因而也显著影响其居留意愿(庞圣民、吕青,2019)。相应地,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即是,考察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如何,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会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产生怎样影响。

1 文献述评与概念界定

1.1 就业质量相关研究

国际劳工组织(ILO)于1995年提出“就业质量”相关概念,即“核心劳工标准(Core Labor Standards)”,旨在通过国际公约形式建立和保障劳工合法权益;1999年首次提出“体面劳动(Decent Work)”理念(国际劳工组织,1999)。欧盟提出了“工作质量(Quality of Job)”的概念(欧盟,2001)。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基金会认为就业质量包括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工作和非工作生活协调四个维度,提出就业质量包含“就业本身特点”和“工作和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两大维度共16个指标(European Foundation, 2002)。目前国内借鉴较多的是Leschke和Watt基于工资、就业的非标准形式、工作时间和工作生活平衡、工作条件和就业保障、技能和职业发展、工会参与六个维度建构的较为全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参考(Leschke J, Watt A, 2013)。

国内,刘素华(2005)将就业质量量化为聘用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工作时间四个维度,每个维度细化为多个指标并赋予不同分值。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流动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唐美玲(2013)、石莹等(2011)发现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就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导致农民工就业歧视和就业质量较低。近年来,更多学者也从务工距离、工作转换、健康自评、生育代价、家庭化流动等视角探究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1.2 流动人口家庭随迁、居留意愿与就业质量

研究发现,发生家庭随迁的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及制度认同感相对高,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参与程度较高(高健等,2016)。流入地家庭网络对其劳动参与率、职业类别和收入都有着显著影响(李树茁等,2007)。但也有研究发现,家庭随迁会降低流动人口就业处境,如谢建社(2011)发现,子女随迁所带来的教育和生活成本,影响就业。同时,家庭化流动对就业的影响有显著的性别差异(Anne Gronlund, 2007)。家庭随迁有助于男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但对女性就业有负面影响(张航空、杜静宜,2012)。

以往关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社会经济、人力资本和经济特征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Massey, Douglas S, 1987)。家庭化迁移长期居留意愿更高(任远、戴星翼,2003)。收入越高,长期居留意愿越强(李树茁等,2014)。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以居留意愿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对于就业状况(如就业质量)影响的研究还较匮乏。

总体上,目前学者们较多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其就业率、就业结构、劳动收入、就业稳定性等方面的影响,却较少关注到家庭随迁因素对于就业质量意义上带来何种影响。与此同时,也尚未关注在流入地的居留意

愿对于其就业质量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因此,这也是本文立意所在。

1.3 概念界定

本研究的对象是流动人口,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方向与程度。

1.3.1 流动人口与就业质量

流动人口是指依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动态调查,将流动人口定义为“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世界银行,2009)的、到流入地居住、非流入地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入人口。”就业质量是指涵盖年满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险四个层面的综合概念。

1.3.2 家庭随迁与居留意愿

家庭随迁是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家庭迁移规模”来衡量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情况,不考虑户籍变动,将至少有两名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工作、生活的迁移定义为发生了家庭随迁。居留意愿是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否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将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的定义为有居留意愿。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个体在决定是否迁移时不仅考虑个人效用,更顾及家庭整体收益。流动人口携带家庭成员随迁到流入地,需要承担更重的“养家”责任,可能做出为获取更多收入而快速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工作时间、超负荷工作等决策。此外,随迁家庭成员增多,流动人口生活负担加重,可能会由于生活成本的压力,忽视合法劳动权益和福利获得,放弃社会保险参与。

基于此,提出假设1: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情况显著影响其就业质量。携带家庭成员一起随迁的相对于无人随迁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低,家庭随迁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越低。

同时,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其就业处境之间存在关联。越是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者,面对生活、经济、住房等各种压力,越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越容易以更积极的心态投入劳动力市场,促进就业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选择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一般对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处境更有信心,社会融入程度较高,这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高。

就此,提出假设2: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对其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相较于不确定或不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越高。

2.2 数据来源与方法

2.2.1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研究数据来源为国家卫计委组织的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数据处理,研究样本数据总量为77 486人。其中,男性样本为43 317人,所占比例为55.90%;女性样本为34 169人,所占比例为44.10%。

2.2.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我们选取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险四个维度来测量。核心解释变量依据人口流动中呈现的新现状,即家庭成员随迁和选择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选取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控制变量包括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两类。

(1) 被解释变量: 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

结合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借鉴欧洲基金会就业质量四维度和国内学者观点(刘素华,2005),拟采用以下指标:

工资水平。研究用问卷中“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收入多少(不包含包吃包住费)?”来衡量其工

资水平。

工作强度,即周工作时间。工作时间是衡量劳动者工作强度、工作和生活平衡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影响其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即问卷中的“您上个月(或上次就业)平均每周工作几小时?”。

就业稳定性,即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采用问卷中“您当前与就业单位签订何种劳动合同?”。根据回答情况处理为“是否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二分变量,用“是”、“否”来代表签订情况。

社会保险,选取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来表示。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该群体养老保险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依然不高(明娟,2016)。问题“您是否参加了养老保险(含新农保、养老金等)”将“社会保险”的代理变量即养老保险的参与处理为二分变量。

(2) 解释变量: 家庭随迁与居留意愿

家庭随迁。用“您在本户同住的家庭其他成员共有几口人?”来表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规模”。将家庭随迁处理为分类变量,包括“无人随迁”、“1~2人随迁”和“3人及以上随迁”三种。

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代理变量的处理,问卷中的问题“是否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回答有“打算”、“返乡”、“继续流动”、“没想好”四种。因此,研究把居留意愿设置为“打算长期居留”、“返乡”、“继续流动”、“没想好”的四分类变量。

表1 变量的基本定义

变量类型和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就业质量			
工资水平	3696.85	2465.06	月收入(元);最小值50,最大值60000
工作强度	50.63	13.89	周工作时间(小时);最小值1,最大值99
就业稳定性	0.68	0.47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0=未签订,1=已签订
社会保险	0.62	0.49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含新农保、养老金等)”;0=未参保,1=参保
解释变量			
家庭随迁	1.81	0.67	1=无人随迁,2=1~2人随迁,3=3人及以上随迁
居留意愿	3.39	0.87	类别变量;1=返乡,2=继续流动,3=没想好,4=打算长期居留
控制变量			
性别	0.44	0.50	0=男(55.90%),1=女(44.10%)
年龄	2.52	0.58	流动人口在2016年5月这一时点的实际年龄;1=35岁以下,2=35~45岁,3=45岁以上
民族	1.08	0.26	1=汉族(92.43%),2=少数民族(7.57%)
户口	1.23	0.49	类别变量;1=农业户口,2=非农户口,3=居民户口
婚姻状况	0.73	0.44	0=未婚(26.70%),1=已婚(73.30%)
受教育程度	2.46	0.82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及大专,4=大学本科及以上
流动时间	2.35	0.83	流动人口到达本次流入地开始到2016年5月这一调查时点的时间间隔;1=1年以下,2=1~5年,3=5~10年,4=10年以上
流动范围	1.66	0.74	类别变量;1=跨省流动,2=省内跨市,3=市内跨县,4=跨境流动
流动区域	1.92	1.04	类别变量;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4=东北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原始数据整理所得

(3) 控制变量

包括流动人口个体和流动特征两方面。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户口、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流动特征主要为流动时间、范围、区域。各变量的基本定义和指标选取详见表1。

2.3 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测量

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维度的处理,采用目前通用的计算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指标框架借鉴客观指标指数(Christine Erhel et al, 2015),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需要对就业质量涵盖的各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为:

$$x_{ij}^{equ} = (x_{ij} - \min_j) / (\max_j - \min_j) \quad j = 1, 2, 3, 4 \quad (2-1)$$

上述公式中 x_{ij}^{equ} 为各客观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指数单维指标, i 代表流动人口个体本身, j 代表衡量就业质量 4 个分项指标维度。其中 $j=1$ 表示工资水平; $j=2$ 表示工作强度, 即工作时间; $j=3$ 代表就业稳定性, 即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 $j=4$ 表示社会保险, 即养老保险的参与程度。 \max_j 表示第 j 项指标最大值, \min_j 表示第 j 项指标最小值。此外, 考虑到就业质量的各测量维度中, 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为正向指标, 与就业质量呈正相关。而工作强度, 即工作时间为负向指标, 过长工作时间将会增加其劳动负荷, 降低就业质量。需要对工作时间的指标进行反向处理, 采用 1 减去工作时间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指标的差作为测量就业质量工作强度维度的反向指标。

之后, 赋予就业质量各分项指标相应的权重, 研究采用等权平均法来构建综合性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同时, 为方便对就业质量指数的含义进行阐释, 将上述计算结果乘以 100, 得到最终处于 0~100 之间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数。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越高, 表明其就业质量越好。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qu_i = \frac{1}{4} \sum_{j=1}^4 x_{ij}^{equ} \times 100 \quad (2-2)$$

2.4 研究方法

具体操作运用 Stata14.0 数据分析软件, 采用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双变量交互统计分析及建立相关模型对相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 采用最小二乘法即 OLS 对综合就业质量指数进行估计, 最后对实证分析部分进行扩展讨论, 并依照代际对就业质量综合维度的估计模型进行分群体验, 以增加模型结果的可信度。

3 流动人口家庭随迁、居留意愿与就业质量的基本状况

该部分主要介绍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就业质量的基本状况并对其家庭成员随迁以及居留意愿特征的基本情况描述。

3.1 流动人口样本基本特征

在对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 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值 77 486 个。下面从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两方面进行描述性分析。

首先, 从民族、年龄、性别、户口、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六个方面对流动人口个体特征进行描述。在样本中, 绝大部分为汉族流动人口, 少数民族仅占总样本的 7.57%。年龄上, 分布在 15 到 81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33 岁, 中位数为 31 岁。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占样本总量的 61.57%, 较为年轻。性别上, 男性和女性分别占 55.90% 和 44.10%, 数量差别不大。户口上看, 绝大部分是农业户口, 占 79.79%。从婚姻状况来看, 已婚的所占比例为 73.30%。受教育程度上, 初中学历最多, 占比 41.99%, 其次为高中、中专以及大专学历占比 36.88%。大学本科及以上最少, 占 9.99%。

其次, 从流动时间、范围和区域三个方面描述流动特征。从流动时间来看, 平均流动时间为 4.91 年。流动时间 1~5 年的占绝大多数, 为 56.19%; 5~10 年占 20.60%; 10 年以上占 12.69%。从流动范围来看, 以跨省流动为主, 所占比例为样本总量的 50.05%; 其次是省内跨市, 占 34.03%; 再次为市内跨县, 占 15.91%。可见, 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形式为跨省流动, 而且数量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而增加。在流动区域上, 东部地区的人口数所占比例超过一半, 为 51.08%, 流向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较少, 分别占 13.83% 和 7.54%。

3.2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基本状况的统计描述

结合流动人口群体的自身特性, 将就业质量的测量确定为包括工资水平、工作强度、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在内的四个指标维度。为避免离群值的影响, 对“工资水平”和工作强度(即“周工作时间”)两个变量在 5% 的水平上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

表2 就业质量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指标	赋值及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工资水平	月收入(元)	3513.06	1601.06
工作强度	周工作时间(小时)	50.90	11.43
就业稳定性	已签订劳动合同 = 1; 无 = 0	0.68	0.47
社会保险	参加养老保险(含新农保、养老金等) = 1; 无 = 0	0.62	0.49
就业质量指数	取值为0~100, 分值越高, 表示就业质量越好	59.14	23.88

资料来源: 同表1

3500元, 标准差为1601.06, 表明该群体内部薪酬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分化。工作强度上, 流动人口平均周工作接近51个小时, 比法定周工作时间44小时多近16%。标准差为11.43, 表明该群体内部的工作时间异质性较弱, 普遍工作负荷较大。就业稳定性方面, 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的签订率平均为68%, 劳动合同的平均签订率超过一半以上。社会保险方面,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平均参与率为62%,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2.2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分布

由图1可知,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呈现出典型的分段集聚现象, 上四分位数为80左右, 下四分位数为40左右, 两者之间距离较大, 表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较为分散, 即该群体就业质量内部差异化明显。中位数约为60, 由中位数的分布和偏向可以看出就业质量指数较低的流动人口明显较多。研究在描述统计部分以就业质量的四分位数为分界, 将就业质量分为40以下, 40~80, 80~100, 以显示其高低水平。

表3 单因素方差分析: 各变量分组样本的就业质量指数均值差异

基本特征	就业质量指数	
	F	P
年龄	342.00	0.00***
性别	247.43	0.00***
民族	213.89	0.00***
户口	2848.43	0.00***
婚姻状况	467.92	0.00***
受教育程度	5037.39	0.00***
流动时间	228.49	0.00***
流动范围	140.18	0.00***
流动区域	786.81	0.00***

3.33个百分点, 可见男性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水平高于女性。从民族看, 汉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水平明显高于少数民族, 低就业质量群体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低5.65个百分点, 而高就业质量群体要高7.02个百分点。从户口看, 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普遍较低, 就业质量指数为40以下的占该群体的26.81%, 比非农业户口和居民户口分别多了15.14%和13.35%; 而指数为80~100的农业户口占该群体的19.28%,

3.2.1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总体来看, 流动人口平均就业质量指数为59.14, 整体不高。指数的标准差为23.88, 表明群体内部存在一定差异。具体来说, 工资水平方面, 月平均工资约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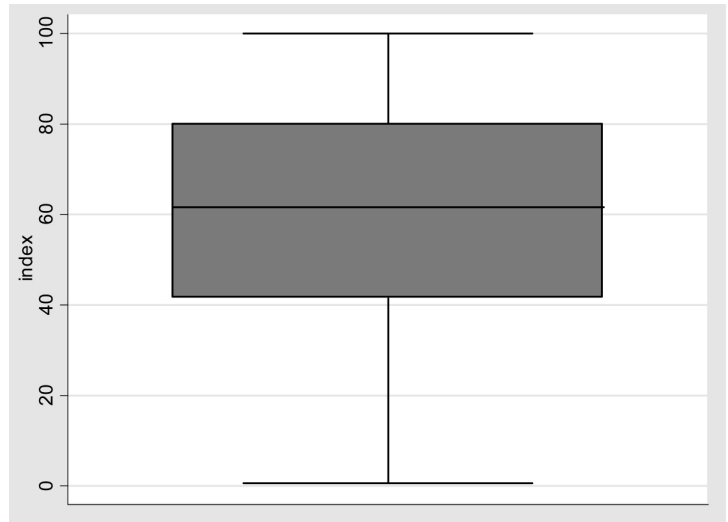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分布情况

3.2.3 流动人口内部异质性分析

表3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各组间就业质量指数均值均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存在差异, 故接下来进一步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内部异质性进行分析。

表4从流动人口内部异质性角度分析其就业质量高低程度。首先, 在个体特征方面, 从年龄看, 各年龄组中指数为40~80的中等就业质量人群均占比较高, 可见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指数40以下的低就业质量群体占各年龄组的比重逐渐增大, 分别为22.93%、23.24%和28.58%, 而指数80~100的高就业质量群体占比逐渐减小, 分别为28.13%、23.96%和14.94%。这表明,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从性别来看, 男性低就业质量群体仅占22.33%, 比女性低了

表4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异质性分析表(N=77486)(单位: %)

基本特征	就业质量指数		
	40 以下	40 ~ 80	80 ~ 100
年龄			
35 岁以下	22.93	48.94	28.13
35 ~ 45 岁	23.24	52.81	23.96
45 岁以上	28.58	56.49	14.94
性别			
男	22.33	50.72	26.94
女	25.66	51.23	23.11
民族			
汉族	23.37	50.84	25.78
少数民族	29.02	52.22	18.76
户口			
农业户口	26.81	53.91	19.28
非农户口	11.67	38.78	49.55
居民户口	13.46	41.90	44.65
婚姻状况			
未婚	27.13	51.74	21.13
已婚	22.59	50.66	26.7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7.83	54.70	7.47
初中	30.72	56.20	13.08
高中/中专及大专	17.07	50.57	32.36
大学本科及以上	3.93	26.08	70.00
流动时间			
1 年以下	28.97	56.18	14.85
1 ~ 5 年	23.38	51.37	25.25
5 ~ 10 年	21.93	48.52	29.54
10 年以上	24.39	48.69	26.92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22.86	48.33	28.81
省内跨市	24.08	52.16	23.76
市内跨县	26.18	56.57	17.25
跨境流动	0.00	71.43	28.57
流动区域			
东部地区	19.78	49.12	31.10
中部地区	26.62	56.65	16.73
西部地区	25.64	53.26	21.10
东北地区	39.15	44.43	16.42

资料来源: 同表 1

则反之。

3.3.2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就业质量

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占样本总数的 57.68%, 举棋不定的占 31.04%, 而不打算长期居留的仅占比 11.10%。其中, 选择返乡的流动人口占 7.54%, 继续流动的占 3.56%。男性选择返乡和继续流动的概率大于女性, 没想好或打算长期居留的则小于女性; 选择返乡、继续流动或没想好的流动人口

比非农户口和居民户口分别减少了 30.27% 和 25.37%。从婚姻状况看, 已婚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较未婚略高。受教育程度方面, 随着教育程度增加, 就业质量指数为 40 以下的低就业质量群体占比逐渐降低, 而 80~100 的高就业质量群体占比呈明显趋势上升, 可见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 就业质量越高。

3.3 家庭随迁、居留意愿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情况相关分析

3.3.1 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与就业质量

无人随迁的流动人口占比 33.84%, 约为总体样本的 1/3 左右。“家庭式流动”已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其中, 1~2 人随迁的流动人口比重最大, 超过半数, 而 3 人及以上随迁的占比为 14.55%。流动人口家庭随迁情况在个体特征上表现出不同特点, 性别上来看, 男性不携带家庭成员流动的概率更大些; 发生家庭随迁的已婚者占比 80% 以上; 35 岁以下的所占比例随家庭随迁的发生和随迁规模的扩大而减少, 而 35~45 岁的比例则增多。此外, 初中及以下的所占比例随着家庭随迁的发生和规模的扩大而上升, 而教育程度更高的所占比例反而下降。

表 5 为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与家庭随迁的交互统计, 卡方值为 231.7616, 自由度为 4, P 值小于 0.01, 不同家庭随迁情况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显著。随着家庭随迁规模扩大, 就业质量指数为 40 以下的流动人口占样本总体比例也逐渐增大, 分别为 21.85%、24.17% 和 27.01%; 而就业质量指数处于 80~100 之间的流动人口占比则随之降低, 分别为 26.05%、26.05% 和 20.54%。这表明, 较低就业质量者的随家庭迁移规模增大逐渐增多, 较高就业质量者

中,已婚的比例明显低于未婚者,而打算长期居留的已婚比例高于未婚者;为小学及以下和初中生,打算长期居留的比重最小,选择返乡的比重最大。高中及以上者选择返乡的占比最小,而打算长期居留的占比最大。

表5 就业质量与家庭随迁列联表分析

家庭随迁	就业质量指数			总计
	40以下	40~80	80~100	
无人随迁	5729 21.85	13659 52.10	6831 26.05	26219 100.00
1~2人随迁	9668 24.17	19907 49.77	10420 26.05	39995 100.00
3人及以上随迁	3045 27.01	5912 52.45	2315 20.54	11272 100.00
总计	18442 23.80	39478 50.95	19566 25.25	77486 100.00

Pearson $\chi^2(4) = 231.7616$
Pr = 0.000

资料来源: 同表1

图2描述了不同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分布百分比。选择返乡和继续流动的就业质量指数在80~100之间比例最少,仅为1.37%和0.66%。而打算长期居留的在40~80之间占比最多,为27.85%;指数为80~100之间占比次之,为18.02%。可见,打算长期居留群体就业质量明显较高。

4 家庭随迁、居留意愿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实证研究

4.1 模型构建

研究运用 Stata14.0 来分析家庭随迁、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指数的影响。就业质量指数是连续数值型变量,适用 OLS 模型,具体构建如下:

$$index_i = \beta_0 + \beta_1 migration_i + \beta_2 residence_i + \sum_{m=1}^M \gamma_m x_{im} + \varepsilon_i \quad (4-1)$$

式中, $index_i$ 表示第 i 名样本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migration_i$ 和 $residence_i$ 分别代表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 x_{im} 表示控制变量,即其他解释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民族、流动时间、区域等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 ε_i 表示其他随机因素影响,即误差项。其中, β_0 为常数项, β_1 、 β_2 分别为家庭随迁及居留意愿的系数, γ_m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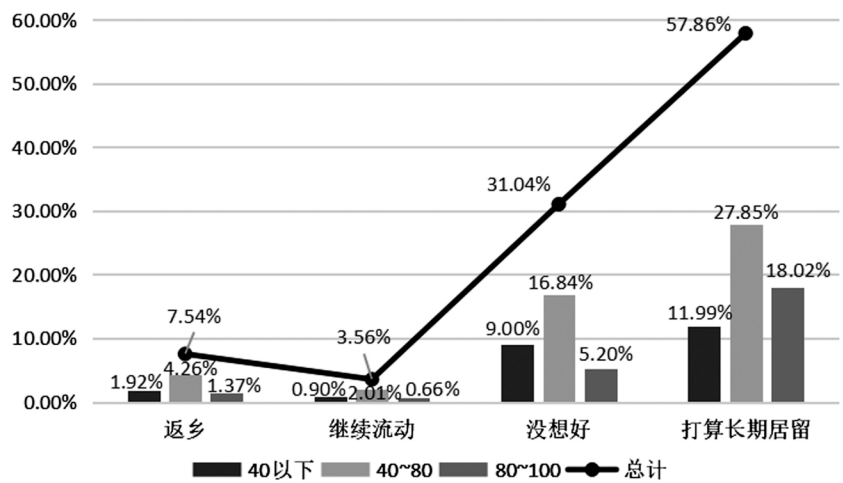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居留意愿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情况

4.2 实证分析

研究选取就业质量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综合维度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前为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我们使用 Stata14.0 中 collin 命令对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分析和容忍度(Tolerance)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 VIF 值介于 1 和 2 之间,均小于 10; Tolerance 值介于 0.7021 和 0.9839 之间,均大于 0.1; 各变量总体 VIF 系数为 1.21。这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较小,不会对方程的参数估计造成严重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各变量四个模型的 R^2 值分别为 0.191、0.223、0.225、0.231,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和常量都显著(Sig < 0.01),模型显著且有效。因就业质量指数为连续数值型变量,采用 OLS 回归进行深入分析。详细回归结果如下表:

表6 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指数影响的 OLS 回归 (N = 77486)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家庭随迁(无人随迁 = 1)				
1~2人随迁			-2.907*** (0.1972)	-3.322*** (0.1980)
3人及以上随迁			-3.904*** (0.2637)	-4.627*** (0.2660)
居留意愿(返乡 = 1)				0.247 (0.4877)
继续流动				-1.424*** (0.3123)
没想好				2.819*** (0.3068)
打算长期居留				-2.931*** (0.1533)
性别(男 = 0)				
女	-2.866*** (0.1571)	-2.939*** (0.1540)	-2.885*** (0.1539)	
年龄(35岁以下 = 1)				
35~45岁	1.529*** (0.1994)	1.581*** (0.1992)	1.532*** (0.1993)	1.607*** (0.1984)
45岁以上	-0.850*** (0.2571)	-0.188 (0.2580)	-0.455* (0.2581)	-0.239 (0.2583)
婚姻状况(未婚 = 0)				
已婚	5.840*** (0.1901)	4.533*** (0.1892)	6.261*** (0.2181)	5.783*** (0.2188)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 1)				
初中	5.076*** (0.2771)	5.475*** (0.2775)	5.428*** (0.2768)	5.250*** (0.2768)
高中/中专及大专	16.59*** (0.2991)	17.03*** (0.2989)	16.84*** (0.2988)	16.21*** (0.3000)
大学本科及以上	31.11*** (0.3558)	30.80*** (0.3507)	30.44*** (0.3513)	29.30*** (0.3548)
户口(农业户口 = 1)				
非农户口	5.837*** (0.2215)	6.287*** (0.2152)	6.109*** (0.2152)	5.795*** (0.2144)
居民户口	6.105*** (0.4161)	5.743*** (0.4151)	5.471*** (0.4146)	5.379*** (0.4117)
民族(汉族 = 1)				
少数民族	-1.943*** (0.2999)	-1.167*** (0.3044)	-1.067*** (0.3037)	-1.005*** (0.3029)
流动时间(1年以下)				
1~5年		3.558*** (0.2621)	4.016*** (0.2635)	3.540*** (0.2639)
5~10年		4.758*** (0.2959)	5.500*** (0.2990)	4.553*** (0.3021)
10年以上		4.381*** (0.3306)	5.301*** (0.3344)	3.984*** (0.3398)
流动范围(跨省流动 = 1)				
省内跨市		-0.614*** (0.1843)	-0.527*** (0.1840)	-0.844*** (0.1842)
市内跨县		-2.007*** (0.2390)	-1.930*** (0.2384)	-2.326*** (0.2390)
跨境流动		7.460 (5.6889)	7.921 (5.7011)	7.466 (5.3603)
流动区域(东部地区 = 1)				
中部地区		-7.142*** (0.2510)	-7.247*** (0.2508)	-7.278*** (0.2501)
西部地区		-4.703*** (0.1975)	-4.570*** (0.1975)	-4.698*** (0.1973)
东北地区		-12.67*** (0.3192)	-12.58*** (0.3189)	-12.92*** (0.3172)
_cons	43.48*** (0.3245)	44.17*** (0.3839)	44.56*** (0.3836)	45.34*** (0.4535)
R ²	0.191	0.223	0.225	0.231
F	2590.3	1707.6	1564.2	1419.8
N	77486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模型一反映了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在性别方面,男性就业质量高于女性。在年龄方面,就业质量呈现“倒 U”趋势,在 45 岁左右达到顶峰。在婚姻状况方面,已婚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明显较高,这表明婚姻对其就业质量有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与就业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户口方面,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最低。在民族方面,汉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高于少数民族。

模型二反映了在控制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流动人口特征(流动时间、流动范围和流动区域)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从流动时间来看,就业质量与流动时间呈显著正相关。从流动范围上,表中显示,相对于跨省流动,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614 和 -2.007,即与更大距离的跨省流动相参照,省内和市内流动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是相反方向的。可见,流动范围与就业质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就业质量逐渐提高。“务工一旦超出本县,务工距离的加大将有助于就业质量的提升”(李中建、袁璐璐,2017)。从流动区域来看,就业质量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和分割,相较于流动到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于就业质量影响是负向的。

模型三是在对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进行控制的基础上,引入核心自变量家庭随迁,研究流动人口家庭随迁与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与各个体特征以及流动特征间依旧存在相关关系。家庭随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以无人随迁的流动人口为参照,携带家庭成员随迁的就业质量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这表明家庭随迁与就业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家庭随迁规模不同,就业质量也存在差异,随迁规模越大,就业质量越低,这结果与本研究假设一相一致。

模型四是在已有基础上,纳入核心解释变量居留意愿,以探讨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对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仍受到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家庭随迁因素的显著影响。以返乡的流动人口为参照,发现继续流动的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这两种选择方式都是不打算长期居留,因而就业质量受到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而“没想好”居留意愿的就业质量回归系数为-1.424,打算长期居留的回归系数为2.819,意味着“举棋不定”的居留状态对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是负向的,打算长期居留的意愿对就业质量影响则显著正向,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假设二。不同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职业构成有所不同,选择“定居”的流动人口就业层次相对较高,就业质量较高。

4.3 扩展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4.3.1 扩展讨论

(1) 内生性检验

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检验处理。选取“流动人口亲生子女数”和“流动人口是否在流入地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分别作为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的工具变量。发现,流动人口家庭随迁与其子女数显著相关。获取更好的城市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而基于本研究数据来源,居民健康档案是否建立则是该群体在流入地公共服务利用的重要表现。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代表流动人口能否获得社会公民资格公共服务(侯慧丽,2016)。两个工具变量一般被认为是外生变量,不会直接影响其就业质量。工具变量相关模型构建如下所示:

$$migration_i = g(Z_{1i}) + \varepsilon_i \quad (4-2)$$

$$residence_i = g(Z_{2i}) + \varepsilon_i \quad (4-3)$$

$$index_i = \beta_0 + \beta_1 g(Z_{1i}) + \beta_2 g(Z_{2i}) + \sum_{m=1}^M \gamma_m x_{im} + \varepsilon_i \quad (4-4)$$

表7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模型一 OLS	模型二 IV
家庭随迁	-2.450*** (0.1311)	
居留意愿 (不居留=0)	长期居留 3.853*** (0.1697)	
子女数		-2.020*** (0.1347)
居民档案 (没建立=0)	建立	3.281*** (0.1790)
_cons	46.78*** (0.4121)	48.93*** (0.6874)
过度识别检验		通过
弱工具变量检验		170.723
R ²	0.230	0.246
F	1621.2	1387.8
N	77 486	77 486

注:***、**、* 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其中 Z_{1i} 和 Z_{2i} 分别表示为内生变量选取的工具变量 $g(\cdot)$ 是关于工具变量 Z_i 的函数, x_{im} 表示一系列诸如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的控制变量, ε_i 表示残差项。式(4-2)和(4-3)即是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内生变量用工具变量的函数表示出来。之后,采用式(4-4)进行第二阶段的IV回归。

在确定了工具变量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实证部分进行检验,篇幅所限,表格里省略了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只列出了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对就业质量综合指数的影响结果。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过度识别检验,两个工具变量均通过了检验,证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根据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是显著相关的。然后进行第

二阶段,估计出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一致影响效应,以克服由于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问题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可见,不论是简单最小二乘回归还是工具变量回归,所有结果都是显著且一致的。家庭随迁会降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而居留意愿能显著促进其就业质量的提升,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 8 交互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一 工资水平	模型二 工作强度	模型三 就业稳定性	模型四 社会保险	模型五 就业质量
家庭随迁 × 居留意愿	100.5 *** (15.5205)	0.737 *** (0.1242)	0.0139 (0.0155)	-0.0013 (0.0151)	0.224 (0.2407)
家庭随迁(无人随迁 = 1)					
1~2 人随迁	-125.4 *** (15.2576)	-0.141 (0.1240)	-0.221 *** (0.0154)	-0.156 *** (0.0149)	-3.496 *** (0.2384)
3 人及以上随迁	-199.6 *** (25.0736)	-0.326 (0.2146)	-0.324 *** (0.0252)	-0.184 *** (0.0247)	-4.977 *** (0.4096)
居留意愿(不居留 = 0)					
长期居留	11.82 (29.7925)	-2.542 *** (0.2331)	0.0933 *** (0.0302)	0.179 *** (0.0291)	3.473 *** (0.4580)
R ²	0.266	0.117	—	—	0.231
Pseudo R ²	—	—	0.091	0.084	—
N	77486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输出结果为回归系数和标准误

(2) 交互效应检验

我们将家庭随迁与居留意愿交互项纳入模型,进行变量间的交互效应检验,以便确定家庭随迁是否会通过不同居留意愿的选择作用于就业质量。

表 8 因篇幅所限,仅将核心解释变量及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作出报告。表明,从就业质量水平看,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的交互项对就业质量指数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在分别影响该群

体的就业质量时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均直接作用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而无需通过交互效应进行间接作用。

表 9 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分群体验证

	模型一 (全样本)	模型二 (老一代)	模型三 (新生代)
家庭随迁(无人随迁 = 1)			
1~2 人随迁	-3.356 *** (0.1979)	-3.261 *** (0.3393)	-3.212 *** (0.2443)
3 人及以上随迁	-4.526 *** (0.2655)	-3.743 *** (0.4390)	-4.797 *** (0.3364)
居留意愿(返乡 = 1)			
继续流动	0.303 (0.4876)	-0.0480 (0.7957)	0.935 (0.6203)
没想好	-1.391 *** (0.3119)	-2.307 *** (0.4760)	-0.486 (0.4136)
打算长期居留	2.852 *** (0.3062)	1.668 *** (0.4637)	3.811 *** (0.40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45.44 *** (0.4375)	48.86 *** (0.7624)	44.21 *** (0.6818)
R ²	0.230	0.181	0.253
F	1543.8	398.7	1117.8
N	77486	26860	50626

4.3.2 稳健性检验

以 1980 年为临界点,将流动人口划分为老一代和新生代(杨菊华,2010),分代际来检验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对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分群体验证结果如表 9 所示。

由上表,无论是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还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随迁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都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负数。与此同时,居留意愿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在不同代际的群体中具有一定异质性。居留意愿对其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越是打算长期居留,其就业质量就越高,且居留意愿对新一代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远远高于老一代。

5 结论、讨论与对策建议

5.1 结论与讨论

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状况整体处于中下等水平,内部异质性十分明显。性别、婚姻、教育程度、户籍等个体特征和流动时间、范围、区域等特征与其就业质量显著相关;家庭随迁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显著。家庭

随迁规模越大,就业质量就越低;居留意愿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长期居留意愿者就业质量状况更高;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代际差异;同等规模的家庭随迁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作用要大于对老一代,就业质量随着居留意愿的增强而提高。

随着社会发展,就业问题的关注不仅包含就业率,就业质量显得尤为重要。对就业质量的关注说到底就是对根本福祉的关注,目前学界对就业质量的研究还不充分。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整体就业质量偏低,适当的政策介入以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显得非常必要。同时,现实中,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逐渐由个人转向家庭,家庭越发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从个人迁移到举家迁移的转变是流动人口流动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定居城市,才算真正完成迁移,才更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我们的研究也恰恰证实了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有显著影响。

我们的研究从家庭视角即家庭迁移及其居留意愿来考察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这在以往研究中还不多见,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研究检验了就业质量及其家庭维度因素的代际差异,尤其关注到家庭规模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这一发现期待有助于我们从更长远视角理解城市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

5.2 对策建议

我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状况不容乐观,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现状,是由家庭随迁情况、居留意愿选择、自身个体因素、流动特征因素等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和居留意愿选择是该群体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程度的写照。因此,在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进行探讨时,需注意社会、家庭和个人力量良性互动。一是建立流动人口就业质量保障体系。具体说来,建立健全劳动法律体系,为提高就业质量提供保障。改变产业发展模式,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逐步破解二元劳动力市场,减少市场中歧视现象和不公平待遇。二是关注流动人口家庭整体需求。具体包括赋予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住房保障,满足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的住房需求。制定优惠政策,定期补贴、关爱留守老人和儿童,为流动人口解决后顾之忧。三是推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长期化。包括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减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阻碍。建立健全支持流动人口居留长期化的财政政策体系,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参考文献:

- Anne Gronlund. More Control, Less Conflict? Job Demand – Control, Gender and Work – Family Conflict, Gender [J]. *Work & Organization*. 2007, 14: 476 – 497
- Christine Erhel, Janine Leschke, Andrew Watt. Trends in Job Quality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for the EU [J]. *Psychopharmacology* 2015.
- European Commission. Employment in Europe [R]. 2008.
- European Commission. Taking Stock of Five Years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R]. Brussels Conference 2001.
- European Foundation. Quality of Work and Employment,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R]. 2002, 6 – 34.
- ILO. Report of the Director – General: Decent Work. 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 [R]. Geneva, 1999.
- Leschke J, Watt A.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Multi – dimensional European Job Quality Index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8: 1 – 31.
- Massey, Douglas S.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 6: 1372 – 1403.
- 高健, 张东辉. 个体迁移、家庭迁移与定居城市: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2016, (4): 99 – 102.
-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 [R].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7. 3 – 18.
- 侯慧丽. 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差异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6, (1): 118 – 125.
- 刘素华. 建立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的步骤和方法 [J]. *人口与经济* 2005, (6): 34 – 38.
- 李树茁, 杨绪松, 任义科等.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 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7, (1): 25 – 33.

(下转第 26 页)

